

“文线”上永不断线的信号站

■周 一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为打破国民党发动的对陕北根据地的重点进攻，果断作出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定，并于29日在陕北清涧枣林沟村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留在陕北，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等人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挺进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各项工

作。4月8日晚，转移至陕北靖边青阳岔的中央前委召开专门会议，为适应转战陕北的军事环境，决定将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800余人，按军事编制组成中央纵队，纵队下辖4个大队。其中，“四大队”为新华社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由范长江担任大队长。这支队

临危受命见本色

转战陕北之初，新华社就完成分兵部署。一处由社长廖承志带队，在延安城旁的清凉山驻地维持日常编发、出版全流程的正常运转。另一处由副总编辑范长江牵头，在瓦窑堡设立前置工作点，提前调试设备、梳理流程，随时做好接替总社全部核心业务的准备。

3月13日，胡宗南部出动大批战飞机对延安发动轮番轰炸。新华社位于清凉山的多处办公窑洞损毁严重，无法支撑正常工作运转。危急之下，总社在出版了当天的《解放日报》后，立即向中央请示获批，由预先部署在瓦窑堡的工作点全面接棒，完成后续的报纸出版和广播等任务。

彼时，瓦窑堡工作点开设不久，各类物资器材还处在运输、整理、调试阶段，突然接到接替全部业务的命令，所有人的神经瞬间紧绷起来。任务部署会上，范长江向全体人员明确要求，必须在3天之内就地出版《解放日报》，同时全面接下新华社的文字、口语广播工作。坚决落实党中央部署，本就是新华社全体成员刻在骨子里的共同信念。印刷厂的同志们当夜就全部投入通宵作业，在陕北当地军民的全力协助下，最终在3月15日顺利印出新一期《解放日报》，整个工作点也顺利完成总社广播的全面接替，圆满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

国民党军在占领延安后，立刻派出部队向北进犯瓦窑堡，设在当地的新华社工作点面临严重的敌情威胁。此时，廖承志已率领新华社大部分人员踏上



长途转移的行军路线，等队伍完全安顿下来恢复出版和广播能力，至少还需要数月时间。为保证党的宣传工作不中断，留守瓦窑堡的新闻工作者一边顶着炮火坚守岗位，一边积极与位于太行涉县的临时总社取得无线电联系。3月25日，我军取得撤离延安后的首场大捷，青化砭一战全歼国民党军第31旅主力，俘虜其旅长、副旅长、参谋长等多名指挥员。这一胜利消息很快登上《解放日报》的版面，又通过不间断的广播传遍各个解放区的城镇乡村。广大群众得知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仍稳稳留在陕北，还能直接指挥人民军队打出这样一场干脆利落的胜仗，个个欢欣鼓舞、斗志倍增。这份来自群众的热烈反响，也成了转战途中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最有力的激励。

恪尽职守战陕北

“四大队”成立后，主要任务有4项。一是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整理后供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及时掌握国内外最新动态。二是同太行总社保持电台通讯联系，一方面传递人民解放军总部战报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社论、新闻等各种文稿及中央对宣传工作的指示；另一方面，向中央转达太行总社有关宣传报道工作的请示报告。三是编辑出版《新闻简报》《参考消息》，通过研究公开情报，整理成参考资料，为党中央决策提供辅助。四是代表远在太行的新华社总社，就近指导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野战军记者的新闻报道业务。

把中央领导同志撰写和审定的社论、评论和重大军事报道，传送到太行总社，并通过总社向国内外播发，是“四大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当时，这些稿件全部冠以“陕北”电头，既象征着中央的声音，又是向人民群众阐明局势、维

系团结的重要纽带。“四大队”始终保持严谨的工作作风，一丝一毫都不敢出错。为保证向太行总社的发报准确无误，大队工作人员将电报文章译好之后，由译电员读电码稿，责任编辑对着原始文稿，逐字逐句逐个标点核对，确定电码无误后，才交由电台部门发出。对于一些重要文章，“四大队”不仅要求在发出时万无一失，还坚持在总社口播时手持原稿收听对照，对收报效果进行核对。

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四大队”一路闯过重重难关，始终坚守在党中央身边。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前，“四大队”奉命向陕北佳县转移。队伍刚准备渡河，就突降暴雨引发山洪，加上敌军从南北两面步步紧逼，不尽快渡河便会陷入绝境。危急关头，驮着全部工作器材的牲口死活不肯下水，一旦器材落入敌手或有所损坏，大队即便脱险也无法恢复工作。10余名年轻队员当即跳进齐胸深的急流，分成两排面对面站成“人墙夹道”，配合饲养员前牵后赶，把所有驮器材的牲口安全送过了河。队伍刚全部上岸，河水便骤然暴涨，后续赶来的中央队伍被挡在对岸。“四大队”立刻组织当地老乡筹集门板木料搭建简易浮桥，保障党中央队伍安全渡河。

精益求精做新闻

“四大队”虽然人手少、设备有限，还常年处在辗转奔波的状态里，但在新闻工作上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尤其是队长范长江，对军事报道格外重视，从前线返回的记者，他都要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逐篇审阅稿件，在充分肯定大家采写成果的同时，及时指出内容疏漏、纠正表述偏差。起初，不少战地记者看到自己的稿件被删减较多，难免产生不满情绪，范长江就拿自己的经历开导大家。他常和身边人说，他自己写的各类文稿，不管是一篇社论、一段访谈还是一



上图：“四大队”编印的《新闻简报》。

左图：新华社新闻台部分人员合影。

则短新闻，送到总社和中央领导同志手里往往都要反复修改好几遍，有的甚至要推倒重写好几轮才能最终定稿。

在范长江的严格要求下，“四大队”里不管是编辑、记者，还是印刷工人、文书，所有人都高度重视自己手上的工作，个个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此外，中央领导同志也亲力亲为，针对一些重要稿件开展“说稿”、辅助编辑，从中央层面牢牢把准新闻的方向与核心要点。1947年4月，国民党政府筹备召开伪“国大”，企图改组政府，装点其所谓“民主政治”的门面。中央计划刊发一篇社论予以揭露和抨击，“四大队”便派出编辑前往周恩来同志的住处，记录下数千字的“说稿”内容，整理后完成刊发。当月22日，社论《新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正式发表，犀利指出蒋介石的行为不过在“继承袁世凯”，“其媚外、残民、打内战、走死路等特点，将无一而不相像”。这篇社论一经发出，立刻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让大家迅速看清蒋政府的真面目，唤起普遍的警觉与憎恶。

1948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从陕西西米脂起程，东渡黄河挺进华北，结束了一年来转战陕北的光辉历程，“四大队”跟随中央机关一同转移，于当年4月下旬抵达河北平山县，与新华社总社顺利会师。自此，新华社的力量重新融为一体，为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全面投入到更为紧张的宣传筹备工作中。在转战陕北的这一年里，“四大队”先后辗转清涧、靖边、安塞、佳县、米脂等地，累计行程数千里，行军驻留时常仅靠两三孔窑洞充当办公场所，用一两块门板临时搭起工作台面开展工作。但全体大队成员始终直面敌情威胁与物资匮乏的重重挑战，把完成党交付的宣传通讯任务摆在最优先位置，充分展现出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高涨的革命热情、坚定的胜利信念，更生动诠释了党的新闻事业与生俱来的光荣感与沉甸甸的使命感。

伙就用木杠合力抬着磨盘前进；到悬崖险处，便前后接应，一步步缓慢往前挪。最终，他们把整盘石磨完整送到3团后勤供给处，解决了部队口粮加工困难的燃眉之急。后来大青山骑兵支队3团后勤供给处奉命转移，这盘承载着军民深情的石磨，就一直留在了大青山骆驼场。

“二十里山路送磨盘”，是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缩影。在粮食几乎被日军抢光、所有进出道路被严密封锁的绝境下，大青山地区的各族群众想尽各种办法，把自家珍藏的粮食和物资送到八路军手中。无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当向导、运粮送草、传递情报、掩护医护人员，不少群众因为支援游击队被敌人逮捕，甚至献出生命。正是广大群众出生入死的全力支援，帮助大青山抗日游击武装一次次渡过难关，接连粉碎敌人的疯狂“扫荡”阴谋。

1980年，内蒙古博物院开展大青山革命文物专项征集工作，将骆驼场留存这这盘石磨运回馆内收藏。如今，这盘石磨静静陈列在内蒙古博物院的展厅中，无声见证着“二十里山路送磨盘”的凡人壮举，也承载着大青山各族人民群众对人民子弟兵的深厚拥戴之情。

链接历史

1930年底至1933年春，红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四次“围剿”。1933年9月25日，接连惨败的国民党当局不甘心失败，纠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至1933年底，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已持续数月，战局陷入艰难境地。为动员全苏区工农群众踊跃歼红，全力投入反“围剿”斗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央苏区筹备于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

12月，中共湘赣省委、湘赣省苏维埃政府选派50余名代表组成湘赣苏区代表团，赴江西瑞金出席这次重要会议。但从湘赣省苏维埃政府驻地永新到瑞金，需途经泰和、遂川、万安、兴国等数县，还必须横渡赣江，路途遥远。加之沿途是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的交错活动区域，代表团随时可能遭遇国民党军袭扰，安全隐患极大。为确保代表团全体成员平安抵达瑞金，湘赣省委、湘赣军区作出决定，由萧克率领红6军团护送代表团赴会。

12月14日，代表团在红6军团护送下，从永新梅花山地区出发，途经永新关背，抵达遂川桥头后，萧克令1个团留在桥头负责掩护，其余部队绕大岗坑，于当日下午护送代表团进至潞田。潞田地处万安县西北部，南通遂川、赣州，北达泰和、吉安，是扼守区域通道的交通要隘，地势险要。当晚，萧克派红6军团第17师51团护送代表团，准备从花生村渡口横渡赣江。

15日拂晓，驻守窑田圩的国民党军第77师461团奉命向潞田进发，企图截击执行护送任务的红51团，阻止湘赣苏区代表团渡江。此前红军已提前获取情报，掌握了敌第77师抵达万安、遂川边境后，正沿赣江一线搜寻红军动向，还分出2个营从万安县高陂、遂川县窑田圩分两路向潞田进犯的部署。萧克结合此前摸排的潞田地形与敌军布防细节深入研判：潞田镇地处三县交界的孤立节点，距离周边敌军据点较远，一旦敌军被牵制包围在此地，短时间内根本得不到援兵；加之这股敌军立足未稳，尚未完成战斗部署，红军完全可以抓住战机发起突袭，一举将其歼灭。

基于这一判断，萧克即以第17师49团占领天胜庵西北高地，高阵以待；以第17师50团占领高平庙高地，利用敌人过去在这里构筑的工事，阻击来犯之敌。同时，急命已完成护送代表团渡赣江任务、返回到镜台的第51团火速经读堂、下石向黄牌下西南高地迂回，断敌退路，力争全歼这股来犯之敌。

接到师部命令后，第51团立即兵分两路，一路由灵陂、黄陂、沿山到黄牌下西南高地附近，隐蔽埋伏，断敌后路；一路经广堂、大石塘、良马塘等地登山，以保卫师部。

当日9时许，敌军以一部兵力控制黄牌下西南高地，主力分两路向红军阵地进攻。在红军猛烈的火力打击下，敌人多次冲锋均被打退且伤亡惨重。

这时，红51团顺利迂回到黄牌下区域，彻底切断敌军退路，让这股敌人瞬间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敌军慌忙收缩兵力，龟缩进垵子上和圩口的几个村落后，凭借村中房屋负隅顽抗、固守待援。

红军3个团抓住战机立刻转入进

巧设伏兵迂回破敌

红六军团潞田战斗

■张磊 马晨光

攻；第49团主力从正面直扑圩口，分出另一路兵力对垵子上实施包围，同时派出一支小分队穿插至罗家流和虎行山一线，严防被围之敌向西南方向逃窜；第50团从高坪庙阵地向圩口、垵子上同步发起攻击；第51团则从侧后方向收紧包围圈。

红军在发起军事打击的同时展开政治攻势，阵前喊话喊出“缴枪不杀”“投降不杀”等口号，极大动摇了敌军军心。这种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打法，以瓦解敌军意志、争取敌军投诚为目标，效果十分显著。此时被围敌军早已四面楚歌，成了彻头彻尾的瓮中之鳖，大批敌军当场缴枪投降。敌团长长气急败坏，率残部在垵子上负隅顽抗，等待救援。

红军对敌形成包围之后，第17师51团1个营率先突入敌军阵地，其他各路红军也发起冲锋，敌军瞬间溃散，除少数残兵侥幸逃脱外，大部被歼。此战红军共俘敌团长以下600余人，缴获各类枪支500余支。

潞田战斗发生于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在敌军重兵压境、来势汹汹的形势下，红军仍能大获全胜，原因有二：一是我军灵活运用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游击战术；二是前线指挥员指挥部署得当，集中3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围歼敌军1个团，让来犯之敌插翅难逃。此外，这场战斗是红军结合战场实际灵活运用兵的典型战例，既极大提振了湘赣苏区军民的士气，狠狠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也鼓舞了苏区群众坚持斗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信心，同时推动遂川、万安、泰和周边区域的工作恢复与开展。

潞田战斗后，第17师沿赣江北上，到吉安和安福地区活动，配合中央红军在赣江以东永丰地区的作战。



红6军团第17师取得战斗胜利后，在五桂堂举行祝捷大会，数千名军民参与。图为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潞田镇木杓坵五桂堂。

资料照片



位于江西省瑞金市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资料照片



白生宝运送过的石磨。资料照片

在内蒙古博物院的展厅里，陈列着一盘农家常用的石磨，直径64厘米，整体高度20厘米，由上下两扇磨盘组成，盘面凿刻着条状凹槽，留存着清晰的使用痕迹。这盘石磨是抗日战争时期内蒙古武川县群众白生宝等人历尽艰辛，专程送往八路军驻地的磨面工具，见证了敌后根据地人民群众与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之间的深厚情谊。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攻陷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绥远（今内蒙古西部）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基于大青山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八路军总部经请示中共中央，决定由位于晋西北的八路军120师率先派出部分力量，挺进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8年6月下旬，第120师抽调第358旅715团和师属骑兵营1个连组成大青山支队，筹备挺进绥远敌后。7月底，大青山支队正式誓师出征，突破敌人设置的重重封锁，于9月初进入大青山腹地。此后，部队以大青山为依托，在原绥远敌占区的城镇、农村及平绥铁

二十里山路送磨盘

■彭林辉

路沿线两侧主动出击，坚决打击日伪军势力、清剿危害群众的土匪武装。短短3个月时间里，部队转战阴山南北700余里，接连取得多场战斗胜利，缴获敌人大批武器装备，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结合大青山地区草原广袤、地形开阔的地理特点及应对日伪军骑兵的实际对敌斗争需求，大青山支队逐步完成由步兵向骑兵的转型。1940年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大青山支队正式改名为大青山骑兵支队。从此，这支驰骋在大青山南北的草原骑兵队伍，始终在敌强我弱、环境极端艰苦、物资供给困难、远离后方依托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在八路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的艰苦岁月里，大青山根据地的各族群众始终给予子弟兵全方位的支援，留下了数不清的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二十里山路送磨盘”正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段。

1942年，日军针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愈发频繁、规模持续扩大，还在交通要道和战略节点大量增设据点，对周边游击区展开步步紧逼的“蚕食”行动。受此影响，我抗日部队的机动空间被大幅压缩，日常活动陷入极大困境。大青山骑兵支队3团后勤供给处被迫向

大青山深处转移，最终落脚在武川县李齐沟村南山腹地的骆驼场。由于部队地处深山，在日军持续的军事“扫荡”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双重挤压下，周边几乎找不到一盘完整可用的石磨，部队加工口粮的难度陡增。炊事员只能靠石臼和铁钵手工把麦粒捣碎，再送到各部队熬成面糊充饥。

得知八路军困难后，李齐沟村民兵队长刘双狮主动提出，要把自家重300余斤的双扇石磨盘送给部队。他找到身强力壮的白生宝和另外4名村民，一同商议把石磨送进深山的具体办法。当时通往骆驼场的山路，只有常年放牧的群众踩出的狭窄羊肠小道，每逢大雨冲刷就会改道移位，沿途还分布着几处陡峭崖壁，稍有不慎就会跌落深沟。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白生宝主动站了出来。

为避开日军巡逻，白生宝决定趁着夜色行动。第一晚，他将100余斤重的下扇磨盘牢牢捆在背上，拄着一截桦树拐杖踏上山路。一路上，他强忍着磨盘碾压带来的皮肉剧痛，摸黑走完20余里崎岖山路，终于把下扇磨盘安全送到骆驼场。第二天夜里，白生宝背起重量超过200斤的上扇磨盘再次出发。这磨盘分量不轻，几位村民一路随行护送。遇到陡峭难行的路段，大